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6, 15(11), 166-172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11521

Hans汉斯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耐心”美德的消解与守护

翟文雨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11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2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2日

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以“即时生成”和“效率至上”的逻辑，正系统侵蚀着作为实践智慧与认知美德的“耐心”。本文分析指出，GenAI通过消解反思时间、外包认知实践、压缩对话空间等方面瓦解了耐心存在的哲学基础，这导致道德主体陷入算法依赖、责任外包与时间异化的三重困境。为应对此危机，必须重构时间认知，在主动探究中锤炼耐心，并推动AI设计伦理从“提供答案”转向“激发思考”。

关键词

人工智能，耐心，美德伦理

The Erosion and Safeguarding of the Virtue of Patience in the Era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nyu Zhai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October 11, 2026; accepted: November 2,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2, 2026

Abstract

With the logic of “instant generation” and “efficiency supremac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is systematically eroding patience as a practical wisdom and cognitive virtu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GenAI undermine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patience by eliminating time for reflection, outsourcing cognitive practices, and compressing the space for deliberation. This traps moral agents in a triple predicament: algorithmic dependency, responsibility delegation, and temporal

文章引用: 翟文雨.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耐心”美德的消解与守护[J]. 哲学进展, 2026, 15(11): 166-172.
DOI: 10.12677/acpp.2026.1511521

alienation. To address this crisis,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our perception of time, cultivate patience through active inquiry, and shift the ethics of AI design from "providing answers" to "stimulating thinking".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tience, Virtue Ethic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何为“耐心”？

在日常理解中，耐心通常被人们简化为一种忍受等待或延迟的消极能力。然而，从德性伦理学的深层视角审视，耐心远非被动的忍耐，它更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主动且复杂的卓越品格，它既是道德行动者在面对困境时保持定力的基石，也是认知主体在追求真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实践智慧[1]。通过回溯其哲学源流，笔者认为可以将其重新界定为一种关乎个体繁荣与认知深度的核心德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中，德性是一种旨在实现“人类繁荣”的品格状态，它表现为在具体情境中践行“中道”的卓越能力。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强调，道德德性并非先天禀赋，而是通过后天实践逐步养成的稳定品格，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幸福与至善[2]。而耐心则要求主体在追求高尚目标的过程中，主动承受认知与行动中的延迟、困难与不确定性，既不急于求成，也不消极懈怠，而是在“中庸”的实践中锤炼意志与判断力。因此耐心则正是这种实践智慧在时间维度上的具体呈现。这种耐心并非对时间的无谓消耗，而是德性养成的必要投入，正如游泳需在实践中习得，耐心也只能在持续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得以强化。耐心在此框架下，并非与速度简单对立的“缓慢”，而是在追求高尚目标的过程中，主动且恰当地管理时间、情绪与意志，以承受必要的延迟、困难与不确定性，并在此过程中保持理智清明与行动毅力的积极能力。它关乎时机的判断，是在“操之过急”与“怠惰因循”两个极端之间所寻得的卓越之道。亚里士多德虽未将耐心列为专门德性，但其对“实践智慧”的强调，已然内含了对时机的审慎等待与对冲动鲁莽的克制，这正是耐心作为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交织作用的体现。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如托马斯·阿奎那，则更明确地将耐心置于德目体系之中，视其为“坚毅”这一核心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阿奎那看来，耐心特指在承受由他者或外部环境所造成的艰辛与迟滞时，能够抵御悲伤与绝望的侵袭，从而保持内心朝向善的稳定意向[3]。在此意义上，耐心不仅是个人修养，更是一种指向他者与世界的道德姿态，它使个体在遭遇挫折时不轻易放弃对邻人之爱与共同善的责任。这种阐释，将耐心从个体性的坚韧提升到了维系社会性联结与道德承诺的层面，这种从个体到社会的思想传承表明，耐心的本质便是主体对自身目标与道德原则的主动坚守，是连接认知过程与德性完善的重要纽带。

东方智慧传统同样赋予耐心以崇高的德性地位。儒家思想中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欲速则不达”等经典论述，深刻揭示了耐心作为达成“仁”与“道”这一终极目标的必要条件。然而，此处的“忍”与“不达”，并非消极无为，而是基于对事物发展内在规律——“时”与“序”——的深刻洞察与主动顺应。这是一种在时间脉络中蓄力、等待并捕捉最佳行动时机的积极姿态，是“君子”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中必须涵养的“沉潜刚克”之工夫。因此，无论是西方“实践智慧”的体现，还是东方“待时而动”的智慧，耐心都被理解为一种与时间和谐共处、并最终驾驭时间的主动型卓越。

倘若将视野从道德实践转向认知领域，耐心的价值同样不容忽视，它构成了深度认知活动的内在韵律与时间结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关于“反省思维”的理论，为理解耐心的认知价值提供了精辟的框架。杜威指出，完整的思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始于困惑、经由持续探究、终于问题解决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环节，即是在提出假设与得出结论之间的“延迟判断”与“持续探究”。正是这一“延迟”，为信息的收集、观念的检验与逻辑的推敲提供了必要的时空，使得思维得以摆脱直觉与偏见的桎梏，走向审慎与深刻。耐心，在此处便体现为对这一必要认知过程的尊重与坚守，是抵御思维惰性与认知仓促的美德。

进一步而言，认知过程中的“困惑期”与“酝酿期”并非应予消除的空白，而是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价值。困惑是思考的起点，而酝酿则是知识得以内化、连接并产生创造性飞跃的隐性温床。许多突破性的科学发现与艺术创作，并非产生于紧张的即时推理，而是在经历了长期的沉思、看似停滞的酝酿之后，于不经意间涌现。在传统认知实践中，个体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往往需要经历一段“悬而未决”的困惑阶段：既有的知识体系无法直接给出答案，需通过持续积累、反复试错与隐性思考逐步逼近真相。这段看似“无效率”的酝酿期，实则是不同知识模块的整合、隐性经验的激活过程，是创造性解决方案诞生的土壤。耐心让主体能够接纳这种认知上的“不圆满”，拒绝用肤浅答案终结探究，从而在持续追问中实现知识的深度内化与智慧的生成。因此，耐心不仅是道德品格，更是一种认知美德，它确保了求知之旅不仅是信息的传输，更是意义的生成与主体认知能力的锤炼。

2. GenAI 对“耐心”美德的结构性侵蚀

2.1. 瓦解耐心的时间基础

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4]中提出的“技术座架”理论，深刻揭示了技术时代对人类存在方式的根本性重塑：它并非单纯的工具集合，而是一种支配性的思维框架，将世界万物乃至人类自身都纳入“可计算、可支配、可优化”的逻辑体系，最终让效率至上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绝对标准。GenAI 的“即时性”特性正是这一“座架”逻辑的极致呈现与强化——从大型语言模型秒级生成文本，到图像生成工具瞬间输出创作成果，GenAI 以“零延迟”的交互体验，将时间从原本承载生存意义、道德思考与生命体验的本真维度，彻底简化为可量化、可压缩的“效率单位”。在这种技术逻辑下，时间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是否能支撑深度反思、情感沉淀或道德成长，而仅在于“是否足够快”“能否被进一步提速”。

这一转化直接冲击了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的核心预设：亚里士多德始终强调，道德判断与德性养成绝非即时性的本能反应，而是需要在时间中展开的审慎过程。他所论述的“在时间中反思”，并非简单的花费时间思考，而是指道德主体在具体情境中，经历“感知情境–回忆经验–权衡价值–预判后果”的完整链条，这一过程必然包含迟疑、纠结甚至暂时的困惑。而耐心，正是支撑主体坚守这一过程、拒绝仓促决策的核心品质——它让主体愿意为了做出符合“中道”的道德选择，忍受等待的煎熬与思考的张力。但 GenAI 的即时性彻底消解了这一道德空间：当问题提出瞬间即可获得标准答案，当道德困境无需耗时权衡便能得到算法最优解，在时间中反思就从“道德必要”沦为“效率冗余”。时间不再是德性生长的土壤[5]，反而成了技术需要征服的障碍，耐心赖以存在的时间维度被彻底抽空，正如当等待被视为必须消除的缺陷时，支撑等待的耐心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2.2. 剥夺耐心的实践土壤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德性即习惯”的核心命题，其深层内涵在于：包括耐心在内的所有道德美德，都不是先天赋予的禀赋，也不是纯粹的理论认知，而是在反复的实践行动中逐渐固化的习性与品格。如同工匠需通过千锤百炼才能掌握精湛技艺，道德主体也需在持续的道德

实践中，通过一次次选择与坚守，将美德内化为自身的存在方式。而耐心的培育，尤其依赖“主动探究”这一核心实践场景。在传统认知模式中，主体要获得知识、解决问题，必须完整经历“信息检索－多元比对－交叉验证－逻辑分析－推理归纳－修正完善”的认知过程。这一过程中，必然会遭遇信息碎片化的困惑、逻辑推导的卡顿、结论待定的迟疑，而正是在克服这些障碍、忍受这些延迟的过程中，耐心得以锤炼：当你为了一篇论文反复查阅文献、核对数据，当你为了一个决策持续调研、征求意见，你所坚守的不仅是目标本身，更是在时间投入中培育耐心的美德。

GenAI 的出现，却以认知过程封装化的逻辑，彻底剥夺了这一实践土壤。它将复杂的思维过程隐藏在算法黑箱之中，用户无需参与任何中间环节，只需输入需求，便可直接获得成品化、打包好的答案。这种认知外包模式，使得主体彻底脱离了认知实践的核心环节：无需再为检索信息花费时间，无需再为梳理逻辑绞尽脑汁，无需再为权衡利弊忍受迟疑，甚至无需再为修正错误付出努力——GenAI 的“一键生成”“智能优化”功能，将所有需要耐心的环节都简化为“点击操作”。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德性养成实践”[6]，在此被技术彻底替代，当主体不再有机会在主动探究中克服困难、忍受延迟，耐心便失去了得以生长的实践场景，就像长期不使用的肌肉会逐渐萎缩，这种美德也会因缺乏锻炼而逐渐消亡，其赖以存在的实践基础被彻底瓦解。

2.3. 压缩耐心的反思空间

苏格拉底的“产婆术”(Maieutics) [7]是西方哲学中引导自主反思的经典范式，其核心魅力在于“不直接给予答案，而是通过持续追问激发思考”。苏格拉底在与他人对话时，往往以无知者的姿态提出问题，通过层层递进的诘难、辨析与引导，迫使对话者直面自身认知的矛盾与局限，在不断地自我修正、反复推敲中自主抵达真理。这一过程注定是耗时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对话者可能陷入长久的沉默，可能多次给出错误答案，可能在逻辑困境中感到迷茫，但正是这种“延迟判断”的空间，让耐心成为反思的必要支撑。它要求对话者容忍思考的缓慢，接受认知的曲折，不急于获得确定性结论。在苏格拉底看来，这种耗时的反思远比直接获得答案更有价值，因为它培育的是主体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坚守真理的品格，而耐心正是这一培育过程的核心美德。

GenAI 的交互模式却与产婆术形成尖锐对立，其本质是对话的终结性——尽管以人机对话的形式呈现，但 GenAI 的设计逻辑始终以“提供完整、确定、无争议的答案”为目标。无论是解答学术问题、分析道德困境，还是创作文本内容，GenAI 都会尽可能输出逻辑自洽、覆盖全面的回应，致力于在瞬间终结用户的困惑，而非激发更深层的思考。当用户询问“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时，GenAI 会直接给出结构化的分析框架与具体建议，而非像苏格拉底那样追问“你眼中的公共利益是什么”“个人利益的边界在哪里”；当用户面临职场伦理冲突时，AI 会快速生成“最优解决方案”，而非引导用户反思自身的价值排序与责任边界。这种终结性回答直接压缩了耐心所需的反思空间：当用户习惯于在瞬间获得确定性答案，便逐渐失去了容忍不确定性的能力，不再愿意为了一个问题花费时间反复琢磨，也不再愿意忍受思考过程中的迟疑与迷茫。耐心所要求的“延迟判断”“持续探究”，在即时答案的冲击下变得毫无必要——毕竟，当算法已经提供了最优解，为何还要浪费时间自我纠结？这种认知习惯的转变，使得反思所需的停顿、迟疑与反复推敲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耐心也因缺乏对应的实践场景而逐渐萎缩，最终被追求即时确定性的认知惯性所替代。

3. “耐心”消解引发的道德主体困境

3.1. 从“审慎判断”到“算法依赖”

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Phronesis)视为道德主体的核心能力，其本质是主体在具体、复杂且充满

不确定性的道德情境中，通过权衡多元价值、考量行为后果、共情他人处境，最终把握“中道”的理性能力。这种智慧绝非抽象规则的僵化套用，而是需要结合具体情境灵活运用的实践品质——例如，同样是“诚实”美德，在面对绝症患者时，“中道”并非直白告知真相(鲁莽)，也非彻底隐瞒(怯懦)，而是在尊重患者知情权与保护其心理健康之间寻找平衡，这一过程必然需要耐心的支撑：耐心倾听患者的担忧，耐心权衡不同选择的后果，耐心等待合适的沟通时机。

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智慧的培育离不开“在时间中反思”的耐心——只有愿意花费时间拆解情境的复杂性，不急于下结论，才能在反复的道德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判断力。但 GenAI 对耐心的消解，直接导致了实践智慧的退化：当 GenAI 能够即时提供标准化的道德方案，主体便逐渐丧失了直面道德困境复杂性的意愿与能力。在职场中，面对利益冲突与团队矛盾，管理者不再耐心调研各方诉求、分析问题根源，而是依赖 AI 生成的管理方案进行机械的执行；在公共事务中，面对价值多元的伦理争议，人们不再愿意投入时间梳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而是直接引用 AI 给出的标准答案作为论证依据。这种算法依赖的本质，是对道德情境复杂性的逃避——GenAI 的答案往往基于通用数据与抽象规则生成，无法涵盖如个体的情感需求、文化背景的差异、突发状况的影响等具体情境中的特殊因素，而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情境化审慎判断”，恰恰要求主体关注这些特殊因素。

当主体习惯了用算法的标准化答案替代自主分析，实践智慧便失去了成长的土壤：既无法在复杂情境中锤炼权衡能力，也无法在道德实践中积累经验，最终导致道德判断的僵化与片面[8]，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灵活运用理性把握中道”的实践智慧，陷入了严重的贫困化危机。

3.2. 从“主动担责”到“责任外包”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确立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核心道德原则，其深层内涵不仅是强调对他人的尊重，更在于确立理性主体的道德自主性——每个具备理性能力的人，都拥有独立做出道德判断、并为自身选择承担全部责任的权利与义务。这种自主性的实现，以主体主动投入道德思考、坚守判断结果为前提，而耐心正是支撑这一过程的关键美德：它要求主体忍受道德抉择的煎熬，不逃避判断的重负，在面对质疑与挑战时，坚守自己的道德选择并承担相应后果。

但 GenAI 的即时性答案，为主体提供了责任外包的便利路径，直接导致道德自主性的削弱。在涉及他人权益的道德选择中，依赖 AI 答案的主体往往将算法视为责任盾牌：当依据 AI 生成的公益项目方案引发社会争议时，组织者会声称“方案由 AI 设计，与自身无关”；当 AI 推荐的人际矛盾调解方式加剧冲突时，使用者会将责任归咎于算法的误导。这种对算法的过度依赖，本质上是对道德责任的逃避，主体不再愿意花费耐心梳理自身的价值排序，也不再愿意主动承担道德选择的后果，而是将判断的权力与责任一同转移给算法。

更严重的是，这种责任外包会逐渐侵蚀主体的道德勇气：当主体习惯了接受算法的“最优解”，便会失去坚守自身道德信念的决心，在面对压力与质疑时，轻易放弃自己的判断。在面对不公正的职场规则时，依赖 AI 给出明哲保身建议的主体，可能会放弃挺身而出的道德勇气；在公共事件中，面对 AI 推荐的主流观点，主体可能会放弃独立思考，选择随波逐流。这种对道德自主性的放弃，与康德所倡导的“理性主体自我负责”的道德理想背道而驰，最终导致道德主体沦为算法的附庸，丧失了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核心尊严。

3.3. 从“接纳时间”到“征服时间”

海德格尔在对“本真时间”[9]的论述中指出，本真的时间体验并非线性流逝的现在序列，而是“过去–现在–未来”融为一体的整体性存在过程——它承认时间的流逝性、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要求人

以向死而生的姿态，直面生命的有限性与可能性。

而耐心，正是人对这种本真时间的接纳与尊重。在道德实践中，耐心意味着接受德性养成的漫长过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德性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长期的实践与坚持”，这意味着容忍道德判断的时间成本——不急于在瞬间做出决定，而是给予思考足够的空间；意味着在时间中沉淀自我——通过日复一日的道德实践，逐渐完善自身品格，成就善性。

GenAI 的即时性文化却彻底颠覆了这种人与时间的和谐关系，强化了“征服时间”的现代性焦虑。GenAI 以“消除延迟”“追求极速”为核心卖点，不断向用户承诺“10 分钟掌握核心知识”“5 分钟生成完整方案”“3 秒获得精准答案”，这种技术逻辑将时间塑造成需要被征服、被压缩的“敌人”，而非需要被接纳的“伙伴”。在这种文化熏陶下，人们逐渐失去了对时间的敬畏。阅读不再是耐心沉浸的精神体验，而是追求“5 分钟读完一本书”的速食式消费；学习不再是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而是急于“快速取证”的功利性行为；道德实践也不再是长期坚守的品格修炼，而是追求“即时见效”的短期行为。这种人与时间关系的异化，直接冲击了德性养成的根基：耐心所要求的“接受漫长过程”，在“征服时间”的执念中变得不可容忍——人们不愿耐心倾听他人的诉求，因为“效率太低”；不愿长期坚守一个道德目标，因为“回报太慢”；不愿忍受德性养成的缓慢进程，因为“见效太迟”。

在人际交往中，人们不再愿意耐心沟通、化解矛盾，而是依赖 AI 生成的沟通话术快速解决问题，却忽视了情感联结的长期培育；在自我提升中，人们不再愿意耐心阅读经典、深度思考，而是依赖 AI 总结的“核心观点”，却丧失了在慢节奏中沉淀智慧的能力。最终，人沦为时间的奴隶而非主人，在追求极速的漩涡中，丧失了与时间和谐共处、在时间中成就德性的本真可能，道德主体的存在意义也被简化为“效率的追求者”，而非“善的实现者”。

4. 重塑“耐心”美德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对耐心美德的结构性侵蚀与道德主体的多重困境，我们并非只能被动接受技术逻辑的支配。重塑耐心，本质上是在技术时代重新确立人与时间、人与认知、人与道德的本真关系，从而守护理性主体的自主性。这不仅需要重构人们的观念，更需要从实践培育与技术伦理规范的角度协同发力，为耐心美德的生长重建土壤。

破解效率至上的技术迷思，首要在于重塑对时间价值的认知。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本真时间”，并非可被压缩的效率单位，而是承载生命体验、道德成长与认知深度的核心维度。我们需要重新唤醒对“慢”的价值认同——这种“慢”并非消极怠惰，而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为卓越而等待”的审慎，是儒家“待时而动”的智慧，是杜威“反省思维”所需的从容。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观念重构体现为对“延迟满足”的重新接纳：阅读时拒绝 5 分钟速读的诱惑，愿意投入时间沉浸文本、咀嚼思想；学习时摒弃快速取证的功利心态，主动经历知识积累、困惑探索与逻辑建构的完整过程；道德抉择时摆脱对即时答案的依赖，坦然接受思考的迟疑与权衡的张力。唯有将时间从“技术征服的对象”还原为“德性养成的土壤”，才能为耐心美德奠定观念基础。同时，需明确区分必要的延迟与无意义的拖延，耐心的核心是为高尚目标主动承受延迟，而非消极浪费时间，这种区分正是实践智慧在时间认知中的具体体现。

亚里士多德“德性即习惯”的命题启示我们，耐心的重塑离不开具体实践的反复锤炼。GenAI 剥夺了传统认知与道德实践中的中间环节，而这些环节恰恰是耐心生长的关键场景[10]。因此，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重拾主动探究的实践，在直面困难、忍受延迟的过程中激活耐心美德。在认知领域，应倡导“批判性使用 GenAI”的实践模式：将 GenAI 视为辅助工具而非认知替代者，在学术研究、问题解决中，保留“信息检索–逻辑梳理–交叉验证”的核心环节。撰写论文时，可利用 AI 辅助检索文献，但坚持自主筛选、比对分析；解决工作难题时，可参考 AI 提供的思路，但主动参与方案的推演、修正与优化。这种“工

具辅助而非认知外包”的实践，能让主体重新经历认知过程中的困惑、迟疑与突破，在克服障碍的过程中锤炼耐心。在道德实践中，回归“情境化反思”的传统智慧：面对伦理困境时，拒绝直接套用 AI 的标准化方案，而是借鉴苏格拉底“产婆术”的精神，通过自我诘问、换位思考、多元价值权衡，自主探索符合具体情境的“中道”。生活中某些看似“低效”的实践，反而能让耐心在重复运用中不断内化，最终成为人类稳定的品格，同时滋养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实践智慧”。

技术对美德的侵蚀，根源在于其“效率至上”的设计逻辑，因此重塑耐心必须同时推动技术伦理的重构，让 GenAI 从“终结思考的工具”转变为“激发思考的助手”，这便需要在技术研发与应用中确立“守护认知自主性”的伦理原则，为耐心美德提供必要的实践空间。从技术设计层面，应打破“即时性 = 最优体验”的单一逻辑：在教育、学术等核心认知场景中，开发引导式探究的 AI 功能，呈现多元观点与争议点，而非直接输出标准答案，只筛选出唯一正确的结论。这种设计思路并非否定技术的价值，而是让技术服务于人的认知成长，为延迟判断、持续探究提供支持。此外，在道德判断、价值抉择等涉及主体自主性的领域，要明确 AI 仅为参考工具，禁止将算法结论作为唯一依据，要强化对 AI 代写、AI 代答的规制，引导学生等使用 ai 工具的群体在自主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培育耐心与独立思考能力。要坚守康德“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原则，防止技术逻辑凌驾于人的道德与认知需求之上，为耐心美德的生长提供制度保障[11]。

5. 结语

耐心作为连接道德实践与认知深度的核心美德，其本质是主体对自身目标与道德原则的主动坚守，是人与时间和谐共处的卓越能力。GenAI 对耐心的侵蚀，本质上是技术逻辑对人之为人的核心品格的挑战。重塑耐心，并非要否定技术的进步价值，而是要在技术时代重新找回人的主体性——既不盲目抗拒技术，也不沦为技术的附庸。当我们重新接纳时间的本真意义，在主动探究中锤炼耐心品格，同时以伦理规范引导技术服务于人的成长，耐心便不再是被技术淘汰的“过时品质”，而是抵御认知浅薄化、道德工具化的重要屏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能重塑耐心美德，更能守护实践智慧与道德自主性，最终实现亚里士多德所追求的“人类繁荣”，在技术时代始终保持“善的实现者”的本真身份，而非沦为“效率的追求者”。这既是对传统美德的传承，也是对技术时代人之存在意义的深刻回应。

参考文献

[1] Coleman, J.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3] 托马斯·阿奎那. 神学大全(第 2 集) [M]. 段德智,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4] 海德格尔. 技术的追问[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925.

[5] Weckert, J. (2005) Trust in Cyberspace. In: Cavalier, R., Ed.,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Our Moral Liv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95-117.

[6] 小播读书.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他的德性论伦理学思想, 到底讲了什么? [EB/OL]. 2023-07-12. http://m.toutiao.com/group/7254857348269736207/?upstream_biz=doubao, 2025-11-07.

[7] 柏拉图. 泰阿泰德篇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 [M]. 王晓朝,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8] Thorseth, M. and Ess, C. (2010) Trust and Virtual World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Peter Lang.

[9]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387-388.

[10] 余党绪. 阅读的转型: 从印证性阅读到思辨性阅读[J]. 教育科学论坛, 2020(19): 27-32.

[11] 约翰·杜威. 我们如何思维[M]. 伍中友,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